

一窗一世界：中式窗棂的样式与寓意



◀冰裂纹式。



▶三交六椀式。



一码三箭式。



万字纹式。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宏大叙事里，窗棂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稳稳承载着实用功能、艺术审美与深厚文化价值。它不仅是通风采光的实用构件，更是建筑的诗眼，将古人的宇宙观、伦理追求与生活理想，凝练于方寸之间的光影游戏之中。

直棂窗是最常见也是最简洁的一种窗棂样式，笔直的线条整齐排列，给人一种简洁大方、端庄稳重的感觉，常见于早期宫殿与民居，象征着秩序与正直。如果在竖向的直棂条的上中下部分再垂直钉上横向的棂条，这就是一码三箭式窗棂。横条象征无穷无尽的长箭悬在门窗上，寓意避除邪恶、威震四方，在明清宫殿的房屋常用。

窗棂图案中的几交几椀是一种精美的建筑装饰图案，以横竖相交的形式构成，造型典雅美观。其蕴含着天地四方的丰富内涵，传达出天地之交而生万物的美好寓意，多应用于宫殿建筑的门窗之上，展现出尊贵与大气。

双交四椀样式棂花由两根斜棂条相交，并在相交处附加花瓣而成为放射状，像极了家庭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一个核心向四周散发着温暖与爱意。这种窗棂装点于闺房或内室，恰到好处地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氛围。

直棂和斜棂相交，形成等边三角形。在每个这样的三角形内，都有六瓣菱花，从而让三角形的相交点呈现出一朵六瓣菱花的形状，而三角形的中心则为圆形，构成独特的隔心棂花样式，这就是三交六椀样式，常被用于装饰等级颇高的宫殿，像太和殿、文华殿等，寓意天地交感、四海升平、政权稳固。它属于古代建筑门窗装修中较为复杂的图案类型，存在诸多变体，比如满天星三交六椀、艾叶三交六椀以及橄榄球纹三交六椀等。这些变体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不过都保留着三根棂子相交这一核心特点。

山西朔州崇福寺的金代大殿，有着全国现存最为复杂的门窗装修样式——六交十二椀。相较于

清代仙人乘槎玉雕



该玉雕摆件长约17厘米，采用圆雕、镂雕技法雕刻仙人乘槎泛舟天河，人物神情、衣饰皆刻画生动，并寓意“一帆风顺”及“平步青云”。

此摆件为清乾隆年间制作的玉雕作品，质地细腻润泽，雕工精湛娴熟，造型传神自然，线条流畅利落。
(据《侨乡科技报》)

犀角雕成浮槎杯



犀角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牙角料之一。人们常说的“竹木牙角”四大雕器中的“角”，主要就是指犀角。商周至春秋时期，我国境内犀牛数量众多，犀牛皮是制作盔甲的上等材料；到了战国时期，连年混战使得犀牛遭到残酷捕杀，加之气候变化的客观原因，导致犀牛几近灭绝，难得一见。《诗经》载：“兕觥，以兕角为主，容五升。”“兕”释义为：雌犀牛。据此可知，早在青铜器盛行的商代便已出现了犀角工艺品，古人已经认识到了犀角的珍贵。

这款犀杯因材施雕，顺犀角之势而成一具水天之际的仙槎，下边用不多的浪涛助成腾涌之意。槎身的宽敞处为杯，旁侧有圆洞与槎端的吸孔相通。虽然它依旧保存了酒杯的形式，其实已成案头清玩，而不再是实用之具。

中国犀角雕刻工艺在明清达到鼎盛。犀角杯，是犀角雕艺术品中名声最大，也是最善于表现的创作形式，历来受到人们的追捧，被誉为古器物中的奇珍异宝。明代时期人们又喜将犀角当药材使用，宫廷御医将犀角雕镂为杯盛入酒后饮用。据《本草·犀》记载：“人药惟犀生者为佳。”用此饮服具有解毒解热之功能。
(据《联谊报》)

观音瓶



该瓶为清康熙青花观音瓶，其器型规整，器身施白釉。

此瓶高45厘米，瓶颈以青花描绘翠竹，瓶身则以通景描绘唐代李白、贺知章、李适之、苏晋、焦遂、崔宗之、李璣、张旭等人豪饮之情景，生动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旷达的精神风貌。
(据《侨乡科技报》)

明景泰款掐丝珐琅八狮纹三环尊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明景泰款掐丝珐琅八狮纹三环尊，高28.7厘米，口径21.4厘米，足距15.6厘米。它的肩部装饰3只铜鎏金兽首衔环耳，底部有3个铜鎏金瑞兽式足。在浅蓝色珐琅地上，装饰八狮戏球纹及杂宝纹。外底中心有阳文“景泰年制”款。此尊的颈和腹并非原配，后人将二者拼接成器，又加装了耳、足，成为新器，款识应为拼器时所做。

明代中期，掐丝珐琅器的装饰题材非常丰富，除缠枝莲花纹外，狮戏球、海马、杂宝纹等也有较多运用，此尊即为一例。
(据《人民政协报》)

萨拉乌苏遗址百年薪火再添新证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2025年内蒙古考古工作交流会上了解到，经过5个多月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萨拉乌苏遗址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为5万年以来北方人群活动研究提供重要实证。

萨拉乌苏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是一处距今至少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已正式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友介绍，自2024年新发现米浪沟湾地点后，2025年又新发现席家旧石器地点。该地点出土标本600余件，其中石制品约80件，动物化石400余件，主要有古棱齿象、披毛犀、羚羊等大型食草动物的化石，以及动物烧骨等。

1922年至1923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我国西北科学考察中发现并发掘了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约200件旧石器。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确切的发掘地点逐渐模糊，成为困扰学界的难题。202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重启萨拉乌苏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2025年萨拉乌苏遗址将结束为期5年的考古发掘，本次新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进展。2021年明确找到1923年文献记载中的邵家沟湾原始地点，纠正了王氏水牛发现地点的误判，在时隔百年之后重新发现了萨拉乌苏最早的旧石器遗址点；2022年在范家沟湾原始地点的基础上，新发现一个含打制石器的文化层；2023年为配合萨拉乌苏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展览和展示利用，分别清理了邵家沟湾和范家沟湾两个地点。

陈福友说，5年来萨拉



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石器。

乌苏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考古标本，包括动物化石、石制品、木炭、灰烬等，其中石器制作小巧细致，特征明显。这些石器均采用锤击法打片，严格遵循“石核—石片”的加工体系。萨拉乌苏的石器属于在中国北方长期流行的小石片石器体系，这些石器的技术、类型与组合一脉相承，表明华夏大地的先民是连续演化、薪火相传的，可以循迹追溯东亚现代人的祖先。

目前，遗址内已发现人类化石出土地点1处、旧石器文化遗址4处、动物群化石出土地点22处。
(据新华社)



▼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王氏水牛化石。